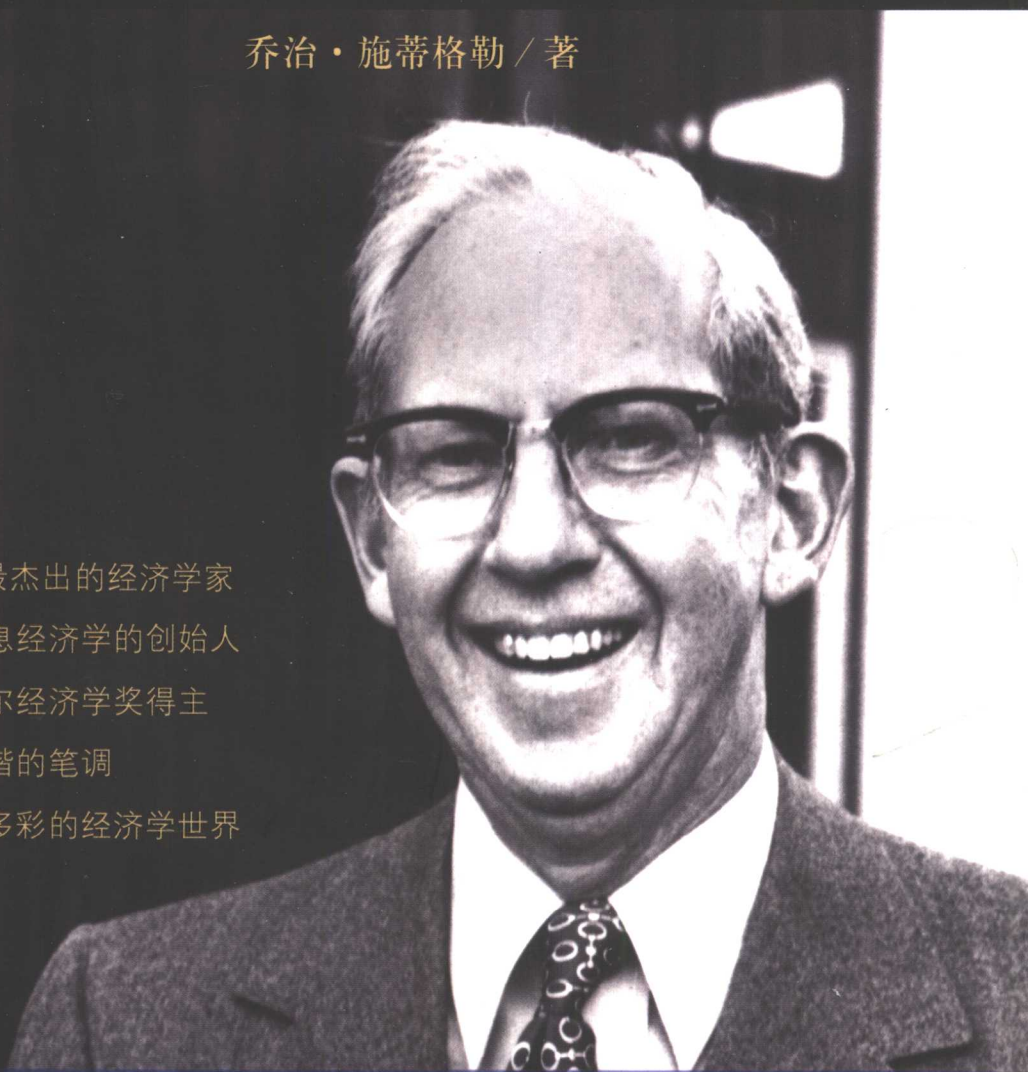


George J. Stigler

乔治·施蒂格勒 / 著

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
198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以幽默诙谐的笔调
回顾多姿多彩的经济学世界



乔治·施蒂格勒 回忆录

一个自由主义
经济学家的自白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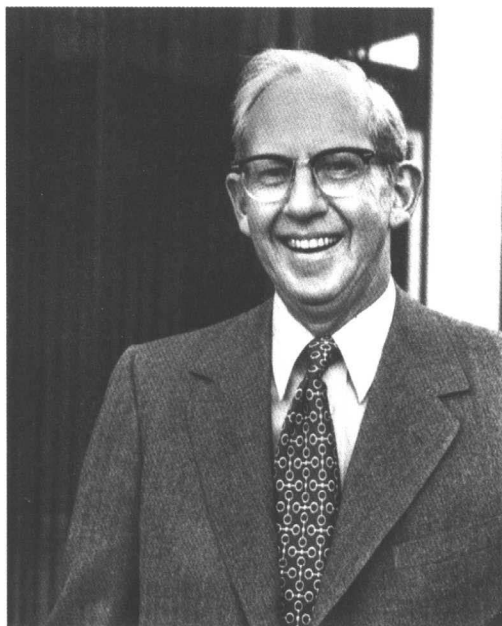
George J. Stigler

乔治·施蒂格勒 / 著
李淑萍 / 译
余江 吴素萍 / 译校

K837.12

264

2006



乔治·施蒂格勒

一个自由主义
经济学家的自白 | 回忆录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 (美) 施蒂格勒著; 李淑萍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5

书名原文: *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ISBN 7-5086-0632-9

I. 乔… II. ①施… ②李… III. 施蒂格勒, G. J. —自传 IV. K837.1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33627号

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by George J. Stigler

Copyright © 1988 by Basic Book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ina CITIC Press (the former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

著 者: 乔治·施蒂格勒

译 者: 李淑萍

译 校: 余 江 吴素萍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56千字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632-9/F · 1018

京权图字: 01-2005-332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斯隆基金会科学系列丛书前言

斯隆基金会 (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科学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一项复杂的事业。科学观点往往反映了几百年来的实验和理论进展, 并且很可能用高等数学语言或高级技术术语来表述。随着科学知识的扩展, 增进大众对科学的理解就变得越来越难。

但与数据、概念和理论不同, 理解科学事业显然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科学是一个由男人和女人共同主导的事业, 他们被一种共同的希望和目标所激励, 在此过程中, 他们可能偶尔取得一点成功, 但也常常会遭受挫败。科学是一项有着自身规则和习惯的事业, 但理解这一事业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而对这一事业的理解必定会使人们洞察科学结果的性质。

斯隆基金会愿借此机会向咨询委员会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该委员会的现任成员包括我们的合作出版商Cornelia and Michael Bessie Books的西蒙·迈克尔·贝西 (Simon Michael Bessie) 主席;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霍华德·希亚特 (Howard Hiatt) 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学院的埃里克·坎德尔 (Eric R. Kandel) 教授, 他同时也是霍华德—休斯 (Howard Hughes) 医学院的高级督察; 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丹尼尔·凯夫勒斯 (Daniel Kevles); 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n);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教授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荣誉校长罗伯特·辛斯海默 (Robert Sinsheimer)；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物理学教授史蒂芬·温伯格 (Steven Weinberg)；以及斯隆基金会的前任主席史蒂芬·怀特 (Stephen White)。此外，该委员会的前成员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教授丹尼尔·迈克法登 (Daniel McFadden) 及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 (Philip Morrison)；南加州大学的前数学教授马克·卡克 (Mark Kac, 已故)；斯坦福大学的前荣誉教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 (Frederick E. Terman, 已故)。斯隆基金会的代表是小阿瑟·辛格 (Arthur L. Singer, Jr)、史蒂芬·怀特、埃里克·瓦纳 (Eric Wanner) 和桑德拉·帕南 (Sandra Panem)。该项目的首个出版商是Harper&Row公司，参与该丛书的是爱德华·柏林格姆 (Edward L. Burlingame) 和莎丽·库利奇 (Sallie Coolidge)。本书是系列丛书即将出版的第六本，参与者为马丁·凯斯勒 (Martin Kessler) 和理查德·利伯曼—史密斯 (Richard Liebmann-Smith)。

作者自序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数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批评家，他的自传有点与众不同：他花了很长一章的篇幅讲述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却只用了很短的一章记述他获得的荣誉和赞美。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稀缺的，包括在任何一个行业中同事的认可。巴贝奇对他所生活的学术圈里的很多流行观点都持批判态度，我也是如此。我对同事的批判没有他来得多，而我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对我也都非常宽容。在美国经济学发展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现过引起学界同仁愤怒的情况，抱怨也不多。

我想在此感谢那些阅读过我自传大部分或全部手稿，并对此给予评论的朋友们。其中最值得感谢的是克莱尔·弗里德兰（Claire Friedland），她像往常一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我那些容易引起错误的表述进行修改。此外还要感谢的人有罗斯（Rose）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夫妇、沙琳（Charlene）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夫妇、约翰·豪斯（John Hause），以及维尔吉妮亚（Virginia）和史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夫妇。

经济学家是好人吗？

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18世纪末才首次得到承认。

1790年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①对欧洲的未来发表了悲观的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经济学家们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却摧毁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以为他们会因此获得某些尊重，当然这样的成就是难以赢得大家的钦佩和喜爱的。不过，伯克显然错了。事实证明，19世纪的英国成了人类发展的黄金时期，从经济到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诡辩家们无疑只是些虚伪的、吹毛求疵的夸夸其谈者而已，从不会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但经济学家和计算机则没有带来什么麻烦，他们甚至还为创造一个辉煌的世纪略尽了绵薄之力。

然而，谴责经济学家的传统还是形成了，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一直热衷于延续这一传统。我不想在此历数那些谴责的细节，它们往往是恶意的攻击，而不是智慧的争辩，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就算经济学家们罪有应得，为什么指责他们会成为一种潮流呢？主要原因非常明显——经济学家一直充当着对社会改革建议“泼冷水”的角色，在那些支持建议的改革者和慈善家看来，经济学家们带来的只会是绝望。

^①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1959年重印, N. 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第91页。

经济学家这种击碎别人美好希望的行为被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搞得尤为声名狼藉。当时的马尔萨斯是一个不错的年轻牧师，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他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卢梭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学生。1794年，戈德温发表过一本名为《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的著作，该书把造成我们这个世界各种问题的原因都归罪于婚姻和财产这类的制度安排。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现，他与父亲发生了分歧。他父亲认为，只要建立了正确的制度，人类就能走向“完美”（至少是品德高尚、生活舒适），而他发现，人类在迈向完美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人类的生育能力远远超过自身和大自然提供生存资料的能力，这种热衷将导致人类生养的后代数量不可避免地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对此深信不疑的马尔萨斯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并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但同时也使经济学家们背上了人类发展的冷血批评家的恶名。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就是经济学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根源。1825年以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在经济学家中也越来越不被认可（因为它是错误的），但经济学家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善意的政策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我最喜欢的一个代表了经济学家怀疑精神的例子是芒蒂福特·朗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他是一位极富天赋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兼律师。

在英国一些地区，生活较富裕的人们通常会在粮食紧缺时期买下小麦，再以半价转售给穷人。显然，这些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但1834年朗菲尔德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演讲集》（*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中则指出，富人们这么做完全没有意义。原因很简单：在下一个丰收季节到来之前，小麦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短缺，因此除非富人们能少吃点粮食，否则穷人能够得到的小麦数量不可能有真正的增加——这个简单的算术经济学家们也是知道的。朗菲尔德天才般地证明，仅靠金钱的转移并不能在下个收获季节来临前生产出小麦，而只会使那些谷物交易商获益。穷人们最终为小麦付的钱还是和他们本来要付的一样多，并不会因为半价买进而得到任何好处。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最初的小麦持有人会获益。富人们的一片好心实际上毫无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大部分的公共角色就是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不管是在朗菲尔德的时代向穷人半价销售小麦，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通过法律来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利率标准，都是如此。经济学家们总是给大家带来坏消息，也因此获得了坏信使的骂名。

但我认为，这种公共角色乃是必要而且重要的。那些办起事情来效率低下或效果适得其反的社会尤其需要知道这一点。医生必须提醒病人警惕那些对其身体无益甚至有害的“秘方”。工程师应该警告议会，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对经济学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学者、牛津大学教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就曾精妙地阐述过这一点。1861年，有一位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的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对经济学家生出了诸多抱怨，而本杰明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护：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感谢您送给我那本小册子，我看了，非常喜欢。

通过那样简明而感人的描写来讨论社会问题，真是一件莫大的善举。

但是，请千万不要与政治经济学为敌：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是一群非常强大而危险的人。

（2）因为法律一旦背离人是自私自利的背景，就将漏洞百出。

（3）（你可能不会同意）因为所有的慈善家们加起来，也不比政治经济学家们通过维护自由贸易政策为劳工阶层带来的利益更多。

就个人品位而言，我希望尽量少用那些慈善事业的术语，比如“使命”之类，因为有学识的人并不喜欢这类含糊不清的表述。虽然在筹钱的时候，这些术语或许是必要的，但从品位的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家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人心难料、世事叵测，所以凭个人的感觉行事未必是最佳的处世之道。

你看，我似乎是想把所有的人文学科都与政治经济学结合

起来。也许有人会说，这种结合是违背人性的，不可能实现。

请原谅我的大胆推断^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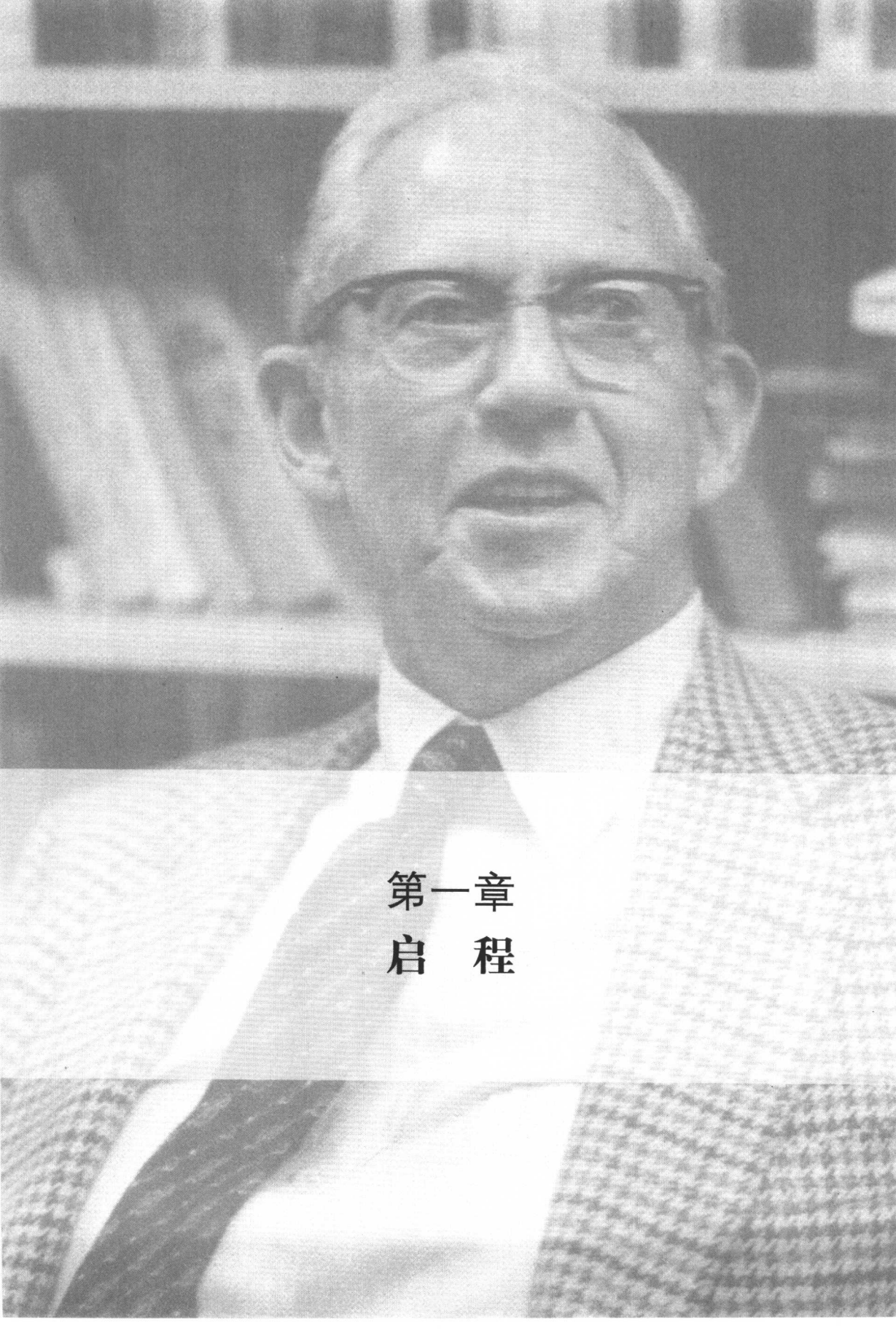
很难对上述的颂扬进行反驳。经济学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正是科学家的使命，否认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无礼、甚至很无知吗？

如果人们同意，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那么，就像许多人对待殡葬行业的态度一样，我们并不要求大家对经济学家有特别的喜爱。经济学家们既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在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等各方面，他们都和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他们，或者说我们，要求别人给予嘉许，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点点与众不同。不谦虚地说，经济学是唯一一门发展得相对成熟的社会科学，它拥有一套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检验的理论体系。经济科学方面的训练会让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稍有不同，希望这些差异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① E. Abbott和L. Cambell主编，*Letters of Benjamin Jowett, M. A. Master of Balliol College, Oxford* (New York: E. P. Dutton, 1899)，第173页。

目 录

斯隆基金会科学系列丛书前言	IV
作者自序.....	VI
前言 经济学家是好人吗?	VII
第一章 启程	1
第二章 大学生活	17
第三章 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经济学.....	33
第四章 科学的战略：国民经济研究局.....	45
第五章 我发现了!	53
第六章 垄断.....	67
第七章 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	83
第八章 作为专家的经济学家	91
第九章 保守主义的学徒	103
第十章 芝加哥学派.....	113
第十一章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131
第十二章 充满火药味的学术生活	139
第十三章 经济学帝国主义	149
第十四章 对前辈的景仰和妄加理解	161



第一章 启程

大多数学者都过着平凡的生活，我也不例外。我既没有领导或参加过骑兵团，也没有抢过银行，更没有教唆过市长甚至总统去干蠢事。不过，既然这本书是关于我的经济学之旅，那我还是先尽量简要地做点自我介绍吧。

1911年我出生在西雅图附近一个名叫伦顿的小镇。我人生中的前20年都是在西雅图度过的，直到大学毕业才离开那里。此后，我去了东海岸读研究生。我父亲约瑟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巴伐利亚来到美国的，在这里他遇见了我的母亲伊丽莎白·洪格勒（Elizabeth Hungler）并与其共结连理。我母亲在少女时代就从匈牙利（那时尚属奥匈帝国）来到了美国，和我父亲一样，她也来自农民家庭，而我则是他们的独生子。

我父亲曾是一名酿酒商，到政府颁布禁酒令之后，他便结束了这一事业，涉足到多个行当。他身体非常壮实，一度做过码头搬运工。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母亲曾因为父亲去参加一个码头工人的聚会而哭喊个不停，那时父亲总是随身带着一根棍子和罗伯特所著的《议事规则》。此后不久，父亲就向房地产市场进军了。在西雅图，大萧条开始得很早，并给这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那时西雅图的很多造船厂都倒闭了，而波音公司还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我父母买下那些破败失修的房子，将其修葺一新，再转卖出去。到16岁时，我已经在西雅图的16个地方住过了。不过，除了像游牧一样地迁徙以外，我们家的生活还算舒适，我父亲更是成了西雅图房地产业的专家。

近年来，巴里·奇思维克（Barry Chiswick）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美国的移民问题。奇思维克发现，来美国的移民往往从报酬很少的工作起家，他们往往很年轻，没有受过任何职业培训（正如我的母亲一样），甚至不会说英语（我父母刚到美国时都是如此）。然而，移民是一个经受了自然选择的群体，他们通常很健康、充满活力并且不畏风险。试想一下，将一个18岁大的女孩送到异域他乡，在那里她语言不通，又要自食其力，

情形会是怎样呢？我母亲的情况比这还好一点，登陆以后，她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只讲德语的社区。奇思维克还发现，在10~20年之后，欧洲移民的收入往往要比年龄、教育水平和经历相似的当地人更高。我估计这一点也在我父亲身上得到了印证。

我也是典型的不同民族融合的产物。直到3岁时，我还只会说德语。此后，随着自己开始和更多的孩子一起玩耍，我便拒绝再说这一语言。等在大学里重新学习德语时（为了报复威廉二世皇帝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在高中没有开设德语课程），我对它已经非常陌生了。不过，我那时还是会玩一种叫做皮纳克尔（Pinochle）的德国纸牌游戏，而且能听懂我父亲的德语。在他所说的德语里，英语单词与日俱增；相应地，他所说的英语句子中的德语单词则日益减少。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两种语言的升降曲线就已经交叉过了。

但我认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自己并不是典型的移民家庭的孩子，因为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挥霍自己的时间。我父母的工作都很辛苦，工时也很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我12岁）。不过在那之后，我的生活基本上还是由自己支配。那段时光回想起来颇有些哈克贝利·费恩式的冒险味道。比如，我曾和伙伴们从联合湖的湖底捞出一条废弃的皮艇，将船底用焦油糊上，然后四处巡游，全然没有顾虑大家都不会游泳的事实。

西雅图和毗邻太平洋的美国西北部是世界上最适合孩子们成长的地方了。在那里，我加入了童子军第44纵队，一个非常富有上进心和冒险精神的团体。不久，我们纵队得到允许，可以到沙点市（Sand Point）一个林木繁密的地方建一座木屋，挨着一座小型的海军航空基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飞机尚未普及。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架小型的陆上飞机降落在毗邻华盛顿湖的一个小小的泥塘湖中，机上的飞行员一边奋力朝岸边游去，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他那天早上出门撞到一棵树，因此一天都不会有什么好运气。我们的队员与那些飞行员们玩过“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我们在华盛顿湖中的救生筏上集结，而他们则开动飞机近距离向我们俯冲下来，要把我们赶入水中。他们最终大获全胜。

随着沙点军事基地的壮大，童子军营地不能维持了，但44纵队也找

到了一个新家。1928年，大北铁路修完了北美最长的隧道，全长8英里，其西端在卡斯凯德山脉的希尼克镇。此前，该铁路用的是一个海拔更高的3英里长的隧道，终点是泰镇。新隧道投入使用后，旧隧道便废弃了，于是我们便兴高采烈地要求大北铁路局将泰镇提供给我们第44纵队——他们还真的答应了！

泰镇以前叫惠灵顿镇。1910年，一场雪崩将一辆停靠在惠灵顿的火车卷了起来，扔到了下面的山谷中，在那场灾难中共有96人丧生。此后的铁路都修建了防雪棚，但那个时候人们还可以在山谷里找到早期车难中留下的钢条。在我们纵队“进驻”前，泰镇刚经历了一场火灾，一片狼藉，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到了一座很好的火车站。泰镇的交通不如沙点镇方便，去沙点镇可以搭电车，而泰镇离西雅图则有50英里远。不过，我们多年以来还是异常频繁地去那个镇搞活动。那时，我和自己的好朋友霍华德·威尔斯已经担任了童子军助理领队，与一位名叫哈罗德·韦尔的热心而慷慨的成年男士共事——而不只是受其领导。

在暑假，我们纵队会跨越奥林匹克山脉，绕过普吉湾，然后向东翻越卡斯凯德山脉。在四五天的远足后，我通常都筋疲力尽、腰酸背痛、汗流浹背，并且对旅途的食物深恶痛绝。每当那个时候我就暗自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然而，当下一个暑假来临时，我们又会“重蹈覆辙”。

从上面的描述中读者应该不难发现，我在暑假期间都没去打工，更不用说做家务活了。不过到最后，在我16岁左右的时候，我和霍华德曾经去过温纳奇山谷，到那儿帮着做些梳理苹果枝杈的工作。苹果往往簇拥着生长，因此必须把它们分散开，让每个苹果能更好地发育。我记得那时我们的报酬是40美分一小时，另包食宿。这份持续了三周的工作就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靠体力劳动挣工资的记录了。其实我从来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十几岁的时候我在暑假里把一半的时间用来打网球（虽然打得并不是很好），还有，我一生中都在做房屋粉刷和维修的工作，但职业的蓝领生涯却非常短暂。

巴伐利亚人不同于传统普鲁士人，在这方面我的父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极度个人主义，而且喜欢冒险（事实上，他还一度迷上过赌博）。有一天，父亲回家时带回一把从当铺买下的小提琴，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那时估计12岁)。我履行义务似的在那把小提琴上吱吱呀呀地拉了几天，声音肯定跟鬼哭狼嚎似的。直到有一天父亲的一个朋友来访，问我是否听说过琴弦润滑剂的用途，拉琴的事才告一段落。没多久，那把小提琴也就被送回了当铺。

1932年的政局非常动荡，而长期以来为共和党人牢牢把握的华盛顿州则成了政治风暴的中心。那时，在各个州政府机关里，只有教育监察部是连一名民主党的候选人都没有的。我父亲便打算提交申请，参选这一职位。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恐慌：“爸爸，你绝不能那么做！你连英语都讲不好呢！”这就是年轻人的自以为是了。最终父亲还是没有递交申请，而民主党夺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教育监察部原来的督察成了唯一一名获得政府机关职位的共和党人。可能我耽误了父亲的前途，华盛顿州的公民也因此失去了好多乐趣，假如果真如此，就允许我在此略表歉意吧！

不过细想起来，我还是认为自己当时的建议没错，尽管我给的理由有问题：毕竟父亲不是去教英语啊！父亲是个很勤奋的人，然而对于政治、官僚以及教育监察他实在知之甚少。事实上，的确有很多成功的商人曾爬到政府的高级管理职位，但其中的很多人——我甚至觉得是大多数人——在新的环境中最终没取得太大的成就。他们往往被一堆消息灵通而顽固不化的下属所包围和左右，还得同那些贪得无厌而戒律森严的议员们打交道。除了这些特质外，教育督察往往还带着故作神圣的坏毛病。当然，我这些分析可能带有点自私自利的成分，因为如果父亲真的竞选成功，我可能也会和他一起干了。

数年后，我父亲真的参加了西雅图市的议会选举，那时共有30多个参选人，竞选为数不多的几个空缺。父亲当时的竞选费用总计2.75美元，他用这些钱做了几张卡片，以介绍自己的背景。可能是因为他的德国名字，他最后还拉到了几千票呢。但此后不久的一天，他走进一家常去买雪茄的香烟店，店主跟他打招呼说：“您没赢得竞选真是可惜！我们可都投了您的票了。”我父亲顿时怒发冲冠：“真是骗人！我在这个地区连一票都没得！”这大概就是所谓选票的秘密吧。

在进入华盛顿州立大学之前，我是酷爱读书的，而且什么书都读，但基本上是个自由散漫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